

中观经济研究: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颜鹏飞 孙波

摘要: 中观经济或称区域经济介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本文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经济增长极的理论特征,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九点新进展,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关于这一理论和相关政策的新思路,其中包括增长极定位新原则、非均衡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都市圈增长极发展战略、牛肚子战略的再思考,以及关于区域差异和协调发展问题的新建议。

关键词: 中观经济 增长极 增长极定位新原则 区域开发新思路

一、增长极理论的九大特征

增长极又称之为发展极、发展点、增长点、吸引中心或扩散中心等,这些术语及其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法国学者佩鲁(F. Perroux)在《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1950年)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年)等著述中,最早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并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平衡增长理论。佩鲁从一般、抽象的经济空间出发,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态的极化过程之中。在他看来,一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它或者是“计划内容”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形式,统计学意义的均质的经济空间形式,或者是作为“势力范围”、“力场”和“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形式。佩鲁着重分析了最后一种经济空间形式。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在于:某些“推进型产业”(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的创新是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因——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发展极。它不仅能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推进效应即吸引和扩散作用能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佩鲁把这种吸引和扩散效应归结为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经济效益(城市化趋势)。佩鲁还对发展极的形成条件作了概括,他认为必须要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佩鲁因而被誉为“挑战传统均衡分析的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就计划和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佩鲁的体系将比凯恩斯和熊彼特的体系更为有用”(希金斯和斯佩格德语)。

综而观之,增长极以及赖以建立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有下述九大特征:

1. 佩鲁增长极理论不仅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1895年)中吸收养料,而且从杜能(J. 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1826年)、龙哈特(W. Launhurt)和韦伯(A. 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的城市区位理论(1932年)、勒施(A. Losch)的生产区位—市场区位理论(1939年)、谢费尔(Shaffle)和勒施的市场区位理论(1940年),以及艾萨尔德(W. Isard)非连续地域空间企业区位和多目标区位理论(1952年)中吸收营养;并引入了引力场、电磁场一类的物理学概念。牛顿和拉法第研究和总结了自然空间(引力场、电磁场)中物质通过场进行相互联系、转换和作用的规律,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研究和总结了经济空间中经济资源通过“受力场”(如特定的农场、工厂、城市和市场)进行相互联系、转换和作用的规律。

2. 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阶段性,因为经济空间是一个由发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或极核)及传输各种力的场所组成,因而具有非均衡性和不平衡性,因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区域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3. 佩鲁所讲的经济空间还具有抽象性,他把抽象的经济结构(各经济要素关系集合体)定义为经济空间,因而与佩鲁所讥笑的“平庸”的地理空间有所不同,它并非是地域性或地理性空间而是抽象的“佩鲁空间”。

4. 佩鲁把增长极视为活动单元(Active Unit)、增长诱导单元(Growth-Inducing Unit)、增长核(Growth Core)以及发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中心(或极核),并把这个中心具体定位为支配性经济单位,推进型产业,创新型企业,关键产业。换言之,可以从创新性产业和部门的角度理解增长极,因而有人把佩鲁意义上的增长极称为“企业增长极”或“产业增长极”。

但是,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量化、模型化和实用化;二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后来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他的弟子缪尔达尔(G. Myrdal)、赫尔希曼(A. Hirschman)和布代维尔(J. Boudeville)对此做了弥补和修正。

5. 缪尔达尔和赫希曼对增长极的运行机制作了补充。增长极与区域腹地的联系和互动机制包括极化效应(各种生产要素向发展极的回流和聚集,因而产生一种扩大地区内经济发展差距的运动趋势)与扩散效应(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从发展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因而产生一种缩小差距的趋势)两种,亦即缪尔达尔所指的回波效应(Bachwash Effect)与扩散效应(Diffusion or Spread Effect)以及赫希曼所指的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与涓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用以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或腹地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寄希望于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不应消极等待发达地区或发展极的“扩散效应”)来刺激发展极周围落后地区的发展,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后来的学者把这种情况归结为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诱导的发展极”现象,这是缪尔达尔增长极理论的精髓。

6. 关于“区域发展极”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性理论。布代维尔等人于1957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这是一种派生的“地理性增长极”,用以区别原生的增长极即佩鲁增长极。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1957年)和《国土整治和发展极》(1972年)等著述中对“经济空间”这一术语作了开拓性(从经济空间拓展到地理空间并从经济理论延伸到经济政策)的系统阐释。在他看来,经济空间既包括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涵盖其所在的地域结构或区位关系;发展极既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他还进而把经济空间或经济区域划分为三类:其一是同一或均质区域;其二是极化区域,其内部不同部分通过发展极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其三是计划区域即政府的计划和政策的实施区域,应该强调指出,这里实际上已把增长极分为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正因为如此,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和中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突破,许多国家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政策和发展战略。但是,布代维尔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把经济空间过于具体化和地理化,即把它改造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并且尤其偏重城市与外围这一特殊区位,从而蜕化为所谓“平庸的”地理空间,忽略经济空间原有的抽象性和全球性而代之以地理性。

因此,既可以从经济空间,也可以从地理空间;既可以从经济理论,也可以从经济政策;既可以从创新性产业、部门,也可以从拥有推进型产业综合体的城市和地域的角度理解增长极,并进而纳入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之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吉尔伯特认为:“增长极与地理学中相对应的增长中心两个概念,逐步为政府部门采纳,并引入到区域开发规划之中,这些概念突破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原因是它已经既为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也为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并加以应用”(Gilbert, 1975)。这是一种增长极、增长中心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性理论。

7. 增长极理论政策化和实用化及其向区位理论、区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理论、区域差异与协调发展理论和区域发

展战略的渗透,促成了区域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尤其是艾萨尔德(W. Isard)总结了诸多国家实施区域经济和增长极政策的经验,并根据亲自参与区域规划和开发工作的实践,相继撰写《区域分析方法》(1960年)和《区域科学导论》(1975年)等著述,为国家干预区域经济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政策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包括增长极理论在内的西方区域经济学说的基础。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运用的增长极政策的成功率占50%,已有28个国家实施或打算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法国8个大城市即“中型发展极”的定位、美国对落后的田纳西流域地区的开发以及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增长区的规划及其实施,都是增长极理论在发达国家成功应用的典范。

8. “核心—边缘”模式、“核心—外围”结构和“中心(发达国家)—依附(发展中国家)”理论是增长极核和所在区域腹地相互关系的扩大化。弗里德曼(J. Friedmann)1966年在对委内瑞拉经济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模式。他认为,任何一个区域都可认为是由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 and 边缘区组成。这一模式的扩大化构成宏观的“核心—外围结构”,即“核心—边缘结构”或“心脏—腹地结构”(Centre - Periphery Structure or Heartland - Interland Structure)。拉美激进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劳尔·普雷维什、塞尔索·富尔塔多、卡多索和法莱托等则据此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理论”或新帝国主义理论。

9. 增长极由点、线、面的衍变是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扩大化。增长极可由点到线,进而演变为增长轴。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增长轴(Growth Axis)是指区域开发的纽带和经济运行的通道。与此相关的名称还有点轴、水轴(沿江沿海发展轴)、居民密集轴、生产力轴(一般呈线性基础设施轴线)、交通轴(运输走廊)、产业轴(如农业轴、通讯轴、建设轴、工业轴)和联系轴等,以及由上述轴组合及衍生的T型、H型、菱形、方格型、兀型、半非型、弗字型、双核型、都市带、经济带,不一而足。德国城市布局 and 区域规划依据增长轴理论,大多采取沿交通线发展的放射状、锯齿状、组团型布局模型。

增长极也可由点到面,进而衍变为区域增长极或发展极,有的称为“成长三角”、“经济增长金三角”、“流域三角洲”、“都市圈”、“综合经济区域”。它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 and 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二、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九大新进展

西方经济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萌芽(18世纪末)、崛起(20世纪中期)、快速发展(20世纪60-70年代)、沉寂(20世纪80年代)阶段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有:

1. 新产业空间理论。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西方学者奥勒曼斯(L. Oerlemans)、米厄斯(M. Meus)、斯科特(Scott)和哈里森(Harrison)等人,在20世纪末提出新产业空间理论。这是对传统的外部经济、聚集经济和增长极

理论的新发展。他们认为,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产业一般呈现出高度的空间聚集性,并局限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亦即增长极。这种新产业聚集机制与以往的产业聚集有所不同。前者打上了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的烙印:产业聚集的目的是交易费用减少,外部规模经济也拓展到外部范围经济;产业聚集形成的原因既是一般的产业联系又是产业的地方化网络联系,其中包括新的转包关系、衍生以及企业间面对面的接触;这种高技术产业特有的聚集机制,对劳动的质量与效率的要求远胜于对劳动成本的考虑,只有具备区域创新环境的地区即拥有大量高质量高效率高技术含量的劳动,才有可能产生成功的产业聚集和协同作用。

2. “集群”和增长极定位新原则。一个企业、一种产业或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生产率密切相关的该地域“集群”(cluster)及其竞争环境,即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的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的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公共物品建设如基础设施和人力与技能库,并创造出信息、激励方式,竞争压力,以及专业化服务、名声等集体财富;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改善创新的条件和有利于新企业的生成等等。这种有利于生产率增长和竞争优势形成的地域,即经济地域增长极或区域增长极。换而言之,增长极定位的新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此即波特(M. Porter)或新竞争经济学或新经济地理学的精髓。因此,这种地域或区域增长极不一定位于传统投入要素的产地(公司不一定设在原料或市场附近),因为竞争优势不是比较优势,后者仅仅依赖现有的资源如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也不一定位于国家政策优惠和资源分配倾斜的地区,因为仅仅依靠国家干预如产业政策,依靠国家组织更多的资源是不能确保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的。

伯格曼与弗塞尔(F. M. Bergman & F. J. Feser)还使用区域集群或产业群概念,在1999年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路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路径以及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方法对该地域“集群”或企业增长极进行选择、定位和分析。

3. 全球性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随着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开始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旧区域主义。埃思尔(Ehler)总结了新区域主义的下述特征:新经济地理理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与大国相联系的许多小国家所奉行的自由化政策是有限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的选择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汉森(Hanson)在1998年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域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迪克斯特(Dixit)、斯蒂格利兹(Stiglitz)、克鲁格曼(Krugma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马丁(Martin)、伯格曼(Bergman)和沃纳伯尔斯(Venables)、伊顿(Eaton)、考图姆(Kortum)和基凡奈蒂(Gvannetti)等为此作出了新贡献。

4. 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西方经济空间(场)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重要发展,大大推动了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佩鲁经济空间理论。1991年,利菲巴维尔(Lefebvre)提出下述观点: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如人口、社会、生态、经济、地理、政治、商业和国家,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可见的。1990年,格林(Greene)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the turbulent field),桑尼斯(Soins)和休因斯(Hewings)提出影响场理论,用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动规律。1991年,泽厄(Juo)和高尔(G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the gradient field)。这说明经济空间(场)理论已进一步动态化、数量化、模型化,并且引入了大系统论思想。

5. 新经济地理理论。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其假设前提是规模经济或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以及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即生产要素的流动是无成本地一瞬间完成的)、外生比较利益等,新区域理论则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引入了空间或地理因素、外部经济、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并把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探讨增长极或优势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因而它如同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为主流派经济学家所接受。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 Stiglitz)在1977年《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一文,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产生。1991年,克鲁格曼(P. Krugman)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试图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动态的多区域模型以及区域跑道模型,把空间因素从而区域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其分析结果表明:“中心—边缘”结构和增长极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瓦尔兹(Walz)1996年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以及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并且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1996年到1999年期间,维纳伯尔斯(Venables)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内,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地理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其结果表明:贸易方式和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并且取决于运输成本和运输密集度,从而产生了新贸易理论。

6. 抨击自上而下依靠外力建立增长极的政策。伯格曼(E. Bergman)、梅尔(G. Maier)和托特林(F. Todtling)在《关于区域问题的再思考》(1991年)等著述中,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建立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的政策提出责难和反思,反对单纯依靠外力(例如外地资本和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的道路,主张依靠内力(例如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能力)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他们对经济增长极理论和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沉寂和影响力下降进行反思,并把其失败原因归结为:一是增长极的“飞地性质”(与周围环境缺乏有机的紧密的联系);二是增长极规划和抉择的政治性质和计划性质,造成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的非兼容性和非协调性;三是增长极的定

位带有盲目性(增长极位置的选择都是建立在城市人口增长计划或全国部门计划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潜力或周围偏远地区需求的基础上);四是增长极理论和政策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五是单纯的增长极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反而使区域差异加剧,以至于增长极政策被说成是“两极分化的发展战略”。

7. 设立孵化器(创新中心)和粘性区。全球迄今已有近4000家孵化器即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同时,为了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洞化”和“空壳化”,提出了建立释放粘胶效应的粘性区域的新举措。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例如意大利东北部和美国的硅谷);二是舵轮式工业区(Hub-and-Spoke Industrial Districts)(例如韩国的釜山、美国的西雅图飞机机械和底特律汽车城);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Statellite Platforms),其特点是总部设在区外的大企业占主导地位,本地政府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政策导向(如税收减免和招商项目),决定该地区的粘胶强度。

8. 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的新探讨。这是从经济发展趋势角度切入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差异、国际差异问题,从而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即区域收敛(趋同)理论以及发散(趋异)理论。区域收敛理论的代表性理论就是20世纪60年代威廉姆森提出的区域收入趋同理论;80年代以来,区域发散理论甚嚣尘上,其代表性理论就是建立在以罗默(Romer)与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基础上的,小阿莫斯(Amos Jr)于1988年提出的区域收入趋异假说。此外,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 & Ngugen)1989年提出富国“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理论;1991和1992年,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 & Sala-i-Martin)等人提出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理论,其分析结论是,发达国家具备收敛和趋同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这种条件。并且这一理论随着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崛起而越来越占上风。西方经济学家大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不仅区际差异扩大化而且国际差异也不断扩大化,而经济全球化是这种差异性和发散性的催化剂。

9. 区域发展目标和区域政策的新变化。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而繁荣于60年代的区域发展和区域政策研究,已成为介于经济地理学和发展经济学之间的一门重要的边缘学科体系。60年代针对衰退区域或未发达区域,重在制订以缩小区际差异为主导目标,旨在减少区域之间福利和收入不平等的公平性区域发展政策,但收效甚微;80年代以来,代之以效率为主导目标,重在促进经济区域快速增长的竞争性区域发展政策。英国自1977年以来把区域发展政策目标锁定在加速落后地区开发,创造新就业岗位;近年来又进而强调推动重点地区建设,用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如建立科技工业园区或工业技术中心等。

综上所述,西方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绎和有力的经验验证,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不失之为发展中观经济或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将它广泛应用于经济规划、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

三、关于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新思考

(一) 增长极的抉择、定位和培育是增长极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着重研究的首要问题

增长极有多种类型。例如狭义增长极即产业增长极(纯经济意义的增长极)、城市增长极和区域增长极(地理或空间意义的增长极),潜在的经济增长极(时间意义上的增长极),广义增长极(凡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生长点,其中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以及增长极的各种衍生形式,等等。

新的增长极的选择方法一般有中心地确定法、腹地分析法和基础设施分析法。中心地确定法的倡导者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W. Christaller)。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出:这个中心地可以是市场(经济发达地区),交通线(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行政管理中心(自然经济地区),并辅之以必要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人口的分析,据此可选定新增长极。藤田和莫瑞(Fujita & Mori)在1996年对克里斯特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成多城市空间。腹地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弗里德曼二元空间结构理论,即任何区域空间系统都是由中心(核心、发达地区、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和外围(腹地、落后地区、边缘区)两个子系统所组成。并通过两者之间物质流量与流向分析,确定腹地与区域系统关系的性质,评判区域系统与区域环境(其中包括域外运输通道)的融合功能,以此作为选择该地域新增长极的依据。此外,新增长极的抉择还取决于该地区基础设施变化(某个大型项目的安排、大型基础设施如桥梁的建设等)所提供的巨大区域效应。

但是,我们要开拓新思路和新方法,重点寻觅和培育新型增长极。

一是把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融于一体的混合新型经济增长极。这种新型增长极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自发的发展极”(先天自发生成的增长极)的优点,又具有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诱导的发展极”(后天自上而下构筑的增长极)的优点,又能克服各自的弊端。一国在区域性开发中,应在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结合点上选择较为发达的城镇、较为先进的地区,具有关联度的推进型产业作为增长极,实行重点推进并带动其他落后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谨防一哄而起的“开发区热”、“光谷热”和“特区热”等等。

二是兼顾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兼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经济增长极。派生的“地理性增长极”论强调特定区域空间尤其是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原生的增长极理论强调全球经济要素的联系和流动。佩鲁当年批判“平庸”的地理空间论。他以拉丁美洲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关系为例,认为拉丁美洲真正的经济增长极在欧洲,部分在美国,两者从经济要素流动和交往中可双双获益。全球新区域主义是原生型经济增长极论的回归。应注重经济空间或佩鲁空间(着眼于全球经济诸要素的流动,具有无形、非实体和不稳定的特征)与地理空间(侧重于区位优势 and 比较优势,具有实体性和稳定性)的结合,从区域经济和全球

经济结合点上选择和培养中国经济增长极(区、带、轴、圈),这就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区。

三是兼顾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新型经济增长极。但在现阶段偏重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资源优势乃至政策优势,而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应偏重竞争优势。

(二)关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

区域经济增长极反映在政策层面就是执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其特征是:总体均衡(大均衡)和局部非均衡(小非均衡)相结合,效率和公平相结合,非均衡推进(强化扩散效应)与协调发展(克服回波效应)相结合,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功能相结合,以及外在牵引力、内在驱动力和区域联动力相结合。这一战略最初具体表现为1992年开始实行的全方位开放政策。1996年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把全国划分为七个跨省市区的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分类指导、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综合经济区域,并系统阐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和国家促进中西部发展的六大政策。理论界人士相继提出四大经济协作区(环渤海、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西部)设想,“点轴发展战略”,“扩大核心区战略”,网络开发战略,推进城市圈经济发展战略,梯度推移和中心辐射相结合的“中心城市联网辐射战略”,中部崛起的“牛肚子”战略(张培刚语),以及各省市县推出的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2000年提出的西部大开放战略和相关政策,则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

(三)关于都市圈增长极发展战略

鉴于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处于中期工业化阶段,应重视以现有12个都市圈(区域增长极)为核心的区域开发思路和政策。应当通过大工业、大城市、区域增长极的重点发展而实施效益型和资源节约型发展战略。这12个都市圈(京津冀地区、沈大地区、吉黑地区、济青地区、湘鄂赣地区、成渝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长江三角洲、关中地区、中原地区、福厦地区)中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

(四)“牛肚子”战略具体化:——培育“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

上海—武汉双核型模式可构成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陆玉麒,1998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区域增长极,武汉有“九省通衢”、“居中独优”的区域效应,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点。无独有偶,美国的经济地理横轴是纽州—芝加哥双核型结构。这一双核模式是“牛肚子”战略的具体化,有助于实施以区域效应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说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第三次战略转移。第一次是开发深圳特区的政策,第二次是浦东新区开发政策。中国经济地理轴的构筑,必将成为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轴。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的“华章”即“重中之重”。

(五)关于区际差异和协调问题的再思考

区域差异包括自然差异、人文差异、经济差异、组织体制差异等等,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只不

过是一个具有描述性意义的中性概念。我们应该允许适度的区际差异,因为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优势,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反映;它也是区域间竞争与合作的基础。但是,区际差异过分悬殊化则会影响资源合理配置、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应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总体和全局出发,协调和正确处理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的关系,应坚持走非平衡增长的道路;二是完全市场型区域协调模式和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的关系,应“双手并举”亦即合理应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三是宏观区域政策(涉及中央政府制定的用以协调区际关系及避免产业趋同的关于各区域产业重点和发展方向的规划)和区域发展政策(涉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关系,制定科学的合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四是公平型区域发展目标和效率型区域发展目标的关系。应兼顾效率和公平,不应该为效率优先而扩大区际差异,也不应为公平优先而制定错误的均衡发展和收入趋同政策。五是行政导向(内含“区域倾斜”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和市场导向的关系,既要谨防“政府缺陷”,例如屡禁不止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愈演愈烈的产业趋同现象,还要谨防“市场缺陷”,例如区际差异悬殊化,应将市场导向政策、区域倾斜政策、产业倾斜政策和协调导向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总之,要找到上述各种关系的最佳结合点,这是中观经济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理论体系的精髓。

参考文献:

1. 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载《经济学季刊》,1950(1)。
2. A. A. Gilbert, 1975. Note on the Incidence of Development in the Vicinity of a Growth Centre. Regional Studies.
3. Meeus, M., L. Oerlemans, 1999.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from within - A Nempir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Multiple Actors in a Dutch Region. Eindoven Centre for Innovation Studies, The Netherlands Working Paper.
4. L. Oerlemans, 1996. The Embedded Firm: Innovation in Industrial Networks (In Dutch). Tilburg: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5. A. Dixit, J. E. Stiglitz,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3).
6.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7. 陆玉麒:《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 颜鹏飞:《经济增长极理论研究》,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2)。
9.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 刘乃全:《区域理论的新发展》,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9)。
11. 颜鹏飞:《经济增长极理论的演变和最新进展》,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N)